

论镜像视角下赵树理小说乡土世界的建构

宋英敏

文华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部 湖北武汉

【摘要】赵树理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山药蛋派的代表作家，其乡土小说以生活化语言绘制出 20 世纪中期中国乡村社会的文学图谱。在赵树理的文学世界中，宗族关系、政治变革与外来文明共同构成农民认知的镜像场域。小说中农民对土地的本能依恋与现代性冲击下的认知迷茫，共同构成社会转型期的文化心理症候。这种文学表达不仅揭示出乡土权力结构对农民主体的镜像式规训，更通过身份构建的微观视角与时代变革的宏观视角交织，在传统人文精神与现代性反思之间建立起独特的文学纽带。

【关键词】赵树理小说；拉康镜像理论；主体意识

【收稿日期】2025 年 9 月 19 日 【出刊日期】2025 年 10 月 15 日 【DOI】10.12208/j.ssr.20250394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ural world in Zhao Shuli's novels from a mirror perspective

Yingmin Song

Wenhua College, Faculty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Wuhan, Hubei

【Abstract】As a representative writer of the Shanxi School (Yao-dan School)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Zhao Shuli's rural novels depict a literary map of China's rural society in the mid-20th century with life-oriented language. In Zhao Shuli's literary world, clan relations, political changes, and foreign civilizations together form a mirror field for farmers' cognition. The peasants' instinctive attachment to the land and their cognitive confusion under the impact of modernity in the novels constitute the cultural-psychological syndrome of the social transition period. This literary expression not only reveals the mirror-like discipline of the rural power structure over the peasant subject, but also establishes a unique literary bond between traditional humanistic spirit and modernity reflection through the interweaving of the micro-perspective of identity construction and the macro-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changes.

【Keywords】Zhao Shuli's novels; Lacan's Mirror Theory; Subject consciousness

1 乡土世界的镜像再现

1.1 环境：三晋文化胎土

基于拉康镜像理论，克里斯特娃用“子宫”象征个体早期认知形成的母体空间，^①这一概念可以类比个体身份构建被乡土文化所影响的地域。赵树理笔下的山西农村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乡土，更是承载着深厚文化记忆的精神家园。在这块经过岁月沉淀的文化胎土上，作品既流淌着汾河两岸的泥土气息，更蕴含着三晋文化基因的深层密码。

太行、吕梁山脉形成的天然屏障保护了三晋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地质学研究曾显示，山西高原自中生代燕山运动以来持续抬升，形成表里山河的地理格局。这种封闭性在《李家庄的变迁》中具象化为驴脊梁骨似的

山道，村民与外界的物资交换需依赖骡马和驴驮运，客观上强化了乡村宗族纽带。

合作社秋收、扩社、开渠和赚钱时虽依赖政策支持，但这和文化内核所遗留的晋商母体传统分不开，也暗合着合作化运动对透明财务的协作和管控要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品中老槐树议事时辈分高的坐石墩，年轻的后生圪蹴着的空间布局，与洪洞大槐树移民传说形成互文——明代移民通过栽植槐树维系宗族记忆，赵树理则将其转化为乡土权力的空间编码。这种文化传统和历史实践层叠累积的思维模式，在历时沉积中保持着文化结构的稳定性。

方言书写作为文化母体的显性表征，在《小二黑结婚》中展现出双重文化功能。三仙姑的神神叨叨与小芹

^① 柏拉图：《蒂迈欧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38 页。

的利利索索，通过晋东南方言特有的韵律节奏获得鲜活的生命力。据《山西方言志》记载，晋语并州片的分音词现象，如圪头词、卜浪（棒），仍保存着上古汉语的特征，这种语言化石成为农民认同文化身份的生物标记。当三仙姑用前世姻缘由天定的宿命论话语规训小芹时，其语言中频繁出现的该然（应当）、待要（想要）等情态动词，实质是借用“方言语法来强化传统伦理习惯”。^①反观小芹坚持的自由结婚新式表达，将外来词汇嵌入俺们的方言句式，形成独特的认知嫁接——既延续了山西方言作为第一人称的语用传统，又通过词汇更新实现自我主体的认同重构。

这个充满张力的文化子宫展示了二十世纪中叶山西农村的社会图景，浓缩了整个中国传统乡土文明转型的过程。《三里湾》马家院落的改建风波，《登记》中艾艾与小晚的婚恋抗争，都展现出文化母体孕育新生命的分娩之痛——既延续传统血脉，又通过脐带把养分输送机制注入政治宣传的新内容。赵树理以其独特的文化自觉，将地理特征和语言传统熔铸成具有普适意义的文学标本。当新时代曙光穿透太行山雾霭，这个文化母体不仅孕育着人物命运的转折，更预示着民族文明形态的涅槃重生。那些山药蛋派的文字犹如解剖刀，剖解出传统中国转型过程中最隐秘的文化DNA，为理解乡村社会机理提供了珍贵的镜像。

1.2 人物：务实与进步

在赵树理构建的乡土镜像剧场中，人物的务实和进步品性生成于乡土生存的本真性实践，是不同场域的生命劳作投射在时代镜像中的认知褶皱。比如，《三里湾》的王玉生在研究水车改造与土起重筐研制时严格遵循高效率原则，体现人物具备现代性的成本管控意识，投射出中国农民的务实性技术人格。指挥大家推石碾的机灵劲儿彰显着土地伦理本身孕育的生存智慧，而对机械效率的苛求又暴露出工业化思维的萌芽。那个蹲在社场角落正痴迷的青年，恰似站在时代镜像节点上的双重投影：前额映着父辈木犁不坏不换新的古训，后背却已触到集体化生产的热浪。

小芹与艾艾们则撕开了镜像的蒙版。它是镜像的附生物，类似于一层传统文化的滤镜，掩盖了主体们的真实诉求，而书中艾艾的勇敢标志着女性形象从被动接受镜像规训，这种对镜像规训的主动爆破，既是个体生命最炽烈的进步宣言，更是乡土女性以身体实践完成的另类务实——转向以主体身份介入历史、书写自

我。她们对婚姻自由的追求实则是女性主体突破礼教囚笼的轨迹。真正的进步性主体从不在镜像前逡巡彷徨，而是敢于将身影烙在新时代的感光胶片上。她们深谙唯有在政治新镜像中刻入自我印记，才能将婚书从宗族契约转化为生存保障的凭据。

即便是守旧者也在裂变中显现出人性的褶皱。三仙姑浮粉下的面孔，则是镜像剧场中最具悲剧张力的文化标本。她总是试图用脂粉填平皱纹沟壑，恰如旧秩序维护者用旧符咒涂抹新法令裂隙的荒诞努力。区政府颁发婚书时，她鬓角油汗在阳光下的冷光，好似旧式合婚书在新时代镜面上的虚焦投影。这个被青年们讥讽为老来俏的旧式女性，实则是困在镜像夹层中的文化遗民，她后续的转变反向印证了封建伦理置换为政治话语时，必须支付的代价：以肉身脂粉为糨糊，把家长制残章与新政策剪报拼贴成护身符。但渗出的油汗，终究泅化了所有精心涂抹的伪装，让其沦为乡土文明转型期最悲怆的进步献祭品。同样，二诸葛在黄历卦象前的剪影，在月光下与墙上忌嫁娶的谶语重叠时，这个老古董般的父亲，何尝不是在用占卜罗盘定位自我价值的坐标系？这也印证了传统农民穿越认知镜像时必须支付的伦理代价。

李有才这个总在俏皮说快板的人物，唱出的实则是民间智者用语言镜像重构权力图谱的尝试。恰似站在新旧文化断层带上的说书人——他舌尖翻转的每一个俚语韵脚，都在为混沌中的乡民校准认知的焦距。当政治话语最终渗透进快板的肌理，这种语言基因的突变本身，便构成了乡土社会最具痛感的进步胎记。而《表明态度》里王永富人物抹去小眼薄皮自评的瞬间，已然映出集体主义镜像的雏形。

这种务实与进步的双重变奏，在各类人物镜像中达成辩证统一。在赵树理建构的乡土剧场中，我们将人物的务实品性与进步诉求置于镜像理论的阐释框架下，那些看似矛盾的生存姿态瞬间显影出深邃的历史景深。这种分析的穿透力在于，它超越了简单的二元对立叙事，揭示出中国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特有的认知褶皱：他们既是用身体丈量土地的镜像书写者，又是被时代镜像改写的文本载体。每个角色在镜像剧场中的位移轨迹，都勾勒出中国乡土社会从宗法伦理向集体主义转型时特有的精神光谱，而这种在镜像撕裂处迸发的生存智慧，正是赵树理超越同时代作家的独特历史洞见。

^① 侯精一：《现代晋语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92页。

1.3 情节：“肢体”意识的表达

赵树理笔下的乡土世界，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农村，更是一个充满生命律动的文化母体。在这个母体中，人物的肢体细节如同投掷在平静湖面的石子，激荡起层层涟漪，展现出个体觉醒与社会转型的复杂互动。借助拉康镜像阶段理论——它强调主体通过镜像认知构建自我认同，并在象征秩序中确立主体位置——我们得以解码这些身体动作背后的文化密码。当艾艾把玩罗汉钱、软英接过地契，这些肢体语言实质构成了认知的双重运动：既接受传统文化的规训，又在镜面裂隙中孕育新的主体形态。

艾艾母亲年轻时摩挲罗汉钱才能入睡的场景，堪称代际肢体意识的诗学呈现。烛光下的同女儿酣睡曾相似的呼吸韵律，是对传统的传承。《传家宝》中李成娘珍视的纺车和针线筐也同这种通过代际模仿的表达一样，是一种映射，每完成一次经纬交织的动作，人物都是在潜意识中确认自己与传统镜像的重合度，本质上都属于拉康所谓的对想象界的认同意识。但当艾艾将铜钱在区政府斩钉截铁公开为恋爱信物时，铜钱金属镜面的反光好似透过她的嘴巴撕开象征秩序之外的“实在界刺点”裂缝——象征体打破了传统的仪式节奏。^①这与《李家庄的变迁》中二姐在被捆绑送县时的肢体反抗形成互文，共同揭示被规训女体对主体性的隐秘追寻。而人物觉醒达到高潮是艾艾得到区认可的情节：人物的直接果敢，既是被父权长期压抑的生理应激，从暗藏到公开的身体演变，完整展现了主体在认知中的成长轨迹。如同《邪不压正》中软英反抗非自主婚约时多次表达的不满一样，更是新主体突破的肢体震颤。

祥英解开裹脚布下肿胀的脚趾是肢体所呈现的美学，构成对传统文化镜像的修正实验。这看似简单的细节，却在赵树理的叙事体系中形成具有原型意义的符号爆破——正如《催粮差》里二先生家的女仆虽是经主人授意推倒人，但用力过劲的肢体意识被泄露了。这些充满破坏性的身体改造，共同构成乡土女性突破囚笼的集体仪式。而祥英在妇救会会议上挺直腰板的瞬间，恰似认知镜像的崩解轨迹：传统规训塑造的卑微女性产生了放射状裂痕，而挺立的身姿成为重构主体认知的符号材料。更具深意的是，这个场景是“社会肢体”的重生——当孟祥英在田间地头与男人们并肩劳动时，

锄头挥动的轨迹不仅划破土地，更撕裂了男耕女织的性别空间分野，是社会辩证重组的意识运动。^②这种通过身体姿态的转变达成的社会重构，与《小二黑结婚》中三仙姑扑粉的仪式性动作对话了：前者以破消解传统的符号，后者用护强化文化镜像的规训，二者通过肢体动作共同映射着拉康的凝视反抗。

在乡土文学中，除裹脚布以外，还有长发等诸多类似意象常常作为传统父权秩序里的性别符号，甚至无意象也是，像《刘二和与王继圣》中女性形象的缺失也可印证。这甚至早已渗透到女性主体本身对自我镜像的虚幻性认同，但赵树理笔下除了《孟祥英翻身》，其他作品几乎都有意规避这种细节。这种笔触本身，同样也是作者在自我所处的时空下独特的肢体意识表达。

进一步的，赵树理对人物肢体语言的敏锐捕捉，往往暗含着镜像凝视的权力机制。《李有才板话》中老槐树下快板人抽搐的嘴角肌肉，泄露着民间艺人在新旧话语体系间的认知痉挛；《卖烟叶》中农村青年们传递烟袋时的指尖相触，构成肢体文化变异的隐秘通道。

《催粮差》里栓牲口的缰绳与现代性小铁绳的双重变奏彰显传统派的经验自信与改良派的技术焦虑，完成了镜像对话。最具启示性的还是学术界偏爱的小腿疼这一典型，具备社会经验的肢体意识传染性，在《锻炼锻炼》中大字报后她冲入社房扑打杨小四，继而引发围观群众群体性表达的规模化。

通过分析可见，赵树理构建的身体政治图谱，实为乡土社会在文化镜面前的自我诊疗。当无数个体的肢体运作通过土地、器物、制度等介质共振传导，最终激发的不是机械运动，而是整个社会这个有机体的生长痛楚——就像《灵泉洞》中村民于洞穴中藏粮、隐蔽的集体场景，象征着革命中的根据地代表的安全性。这每个小的肢体伸展都在重塑整个社会的大认知。这种觉醒本质上是一种神经网络的自然萌发，在破碎与重构中，完成那根植于中国农耕文明深处，对生存伦理范式的文化基因的突变与传承。

从太行山的封闭环境到方言中的古老词汇，这些文化根基塑造了农民对传统的依赖，但被变革的浪潮所打破：《小二黑结婚》中小芹用新式婚恋词汇冲击方言语法，《三里湾》王玉生在改良农具时既遵循祖辈经验又追求现代效率，展现农民主体的撕裂与成长。而艾艾公开罗汉钱、孟祥英挺直腰板的动作，则是他们用身

^① 拉康，《拉康选集》，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10年，第512页。

^② 米歇尔·福柯：《文字即垃圾，危机之后的文学》，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57页。

体戳破传统束缚的最直接宣言。没有这片文化土壤,便没有觉醒;没有撕裂,便没有向前迈步的可能。赵树理让觉醒不再是外来观念的移植,而是从土地深处挣扎出的自愈。

2 乡土社会的镜像反思

2.1 对比:“新历史”下的伦理重塑

根据拉康理论,个体通过与他者的互动完成自我认知的构建。在赵树理的小说中,这种镜像关系不仅体现在个体层面,更扩展为整个乡土社会的伦理重塑过程。在革命浪潮席卷乡土中国的特殊历史节点,赵树理的小说如同摆放在时代岔路口的梳妆镜,既映照出传统文化母体——绵延千年的价值体系与伦理规范的斑驳裂痕,又折射出革命浪潮下所催生的集体主义新意识形态的曙光。

《李家庄的变迁》中当桑树事件个人受害冲突引发的土改工作队的介入,断裂的木纹成为象征界的裂缝,割裂了旧伦理的完整镜像成为国家权力对乡土社会渗透的过渡性历史符号。而裂痕斑驳的树桩成为新旧伦理交锋的见证载体——标志着费孝通所谓的礼治秩序向法理秩序过渡。^①这一变化不仅仅是物理空间的异变,更是传统宗族权力结构与新型集体主义价值观之间的激烈碰撞,反映了乡土社会在现代化转型中的深刻矛盾。铁锁从跪听族长训话到站立主持分田的姿态变化,实则是乡土主体在裂变中重构自我认同的隐喻。拉康理论中的误认在此具象化:当铁锁凝视被公示的李如珍的惶恐时,他必能看到自己被宗族伦理规训的过去小他者的倒影,又在新名称的光影中辨认出大他者于历史革命话语里赋予他的主体性。

而《三里湾》中马家大院的刀把地之争,是传统伦理中主体误认的典型。当合作社规划水渠需拆除马家院墙时,黑漆院门仿佛映出双重影像:正面是马多寿紧攥地契的守旧剪影,背面折射着儿媳王玉梅支持合作化的崭新轮廓。马多寿费尽心机和合作化运动处处对抗,对应拉康的凝视辩证法——老辈试图修补旧镜像的执念,反被新镜的强光灼伤视线。

在院落中交织着的是新旧两代人的算珠声,传统家户经济的封闭被集体劳动的开放映像穿透。马多寿在搅动着的酸浆陶缸水面映射着自己扭曲的倒影——所谓主体误认后破碎了的写照:是因为旧伦理已无法提供完整认同,而新主体的建构仍在虚实之间摇晃。

《邪不压正》中聚财的土地和牲口棚等生产资料

在土改中不断变动的情节则是社会生产关系在随历史发展镜像重构了。

这些一个个日常物件的镜像游戏,不仅展现了赵树理乡村变革时期的实感质地,更揭示了旧传统宗法伦理与新革命集体伦理的历史交织中群众眷恋与惶惑的徘徊心态。这种渐进式伦理重塑为理解中国现代性转型提供了独特视角。镜中斑驳的裂痕与新生光晕共同构成转型期的认知图谱,既非简单的传统断裂,亦非彻底的新旧更迭,而是在互映中重塑而成的第三种经验——传统基质与现代性互嵌共生。

2.2 批判:社会现象的辩证审视

基于赵树理通过土地改革和新婚姻法等相关场景,揭示了乡土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所经历的认知革命。在《李家庄的变迁》与《登记》构成的镜像剧场中,作家将乡土社会推入自我审视之下,其批判锋芒在《小二黑结婚》中三仙姑梳妆镜前的身份焦虑,与《三里湾》里马家算盘珠响中的经济博弈等系列场景中得到系统性呈现。

当铁锁参与清算账目时,新制度和祖宗法在阡陌间短兵相接。前者以数字丈量土地如手术刀剖开宗法制躯体的病灶,而后的欺压落后则是盘踞在封建经济结构的肠梗阻。一个个铁锁紧握镰刀削着匾额时,既承载着揭开旧佃户假面的革命回声,又迸发出新土改的痛快颤音。这一过程不仅体现了新政治账与旧经济账的冲突,更象征着封建经济结构被现代新晋制度逐步取代的历史必然性——正如《三里湾》中马多寿家的地界石被合作社的测绳取代,传统土地伦理在精确计量下显露出了其寄生本质。

《催粮差》里崔九孩解开锁链时的身份重构也是符号被阉割的辩证隐喻。掏出钥匙解开孙甲午脖子的铁链这一动作,实质是权力符号以权谋私的祛魅仪式。与《李家庄的变迁》中阎恒元伪造土地账册形成对位——铁链(暴力式规训)与账册(文化式规训)同属封建统治工具,而它们的废弃共同构成破镜的批判过程。当崔九孩将铁链嘣的一声解开时,金属撞击声实则是旧权力象征秩序崩解的听觉镜像,与《李有才板话》中老槐树上的铁钟作为旧秩序象征在后期被弱化也形成了互文。

在《表明态度》中永富媳妇在劳动分工时做够了的具身反抗的场景也使象征功能得到了延续,成为集体化社会众多变革现象中微观的政治叙事链扣。

^①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1948年,第62页。

而在批斗大会的戏剧高潮中,村长李如珍被群众身体破坏的暴力式批判与《邪不压正》里刘锡元被农民砸神龛、烧地契,这种权威破坏的象征式批判形成共振。群众瞳孔里燃烧的冶炼高温,实则是《李有才板话》中气不死的歌谣的视觉性上的呈现。当赵树理把农民身上套的枷锁“像铁器上的锈一般”用笔尖刮去,仿佛旧时代的氧化层也被一并拭去,这种清理仪式在《传家宝》里李成娘摔碎妆奁时达到了情感上的顶点。^①

正如《互作鉴定》中的知识青年改造,始终以人物生产劳动的具身性实践为核心:刘正通过伪造账本、关系运作试图脱离农村,最终因投机倒把被取消推荐资格;而范灵芝则通过掌握嫁接技术、参与集体劳动获得认可,其技术贡献成为被公社破格推荐的依据。赵树理也曾公开强调知识青年的改造靠的是汗珠子摔成八瓣。

赵树理的镜像实验实为双重诊断法的文学实践:

其一,以手术刀式叙事剖开宗法组织病灶——李成娘摔妆奁的暴力祛魅、灵芝熔镞铸犁的金属涅槃、不够分家时的宗法瓦解构成三重叙事缝合术,通过阶级话语重组家族伦理创伤,这种文化痼疾的生成机制在《卖烟叶》中暴露其辩证性:贾鸿年烟叶正面映现的集体化理想自我,与背面宗族田契下的知识青年疏离、叶脉残留的小生产者自私碎片,共同构成中国现代性特有的镜像畸变场域。其二,拉康三界的拓扑纠缠在此获得乡土转译——农民主体在政策凝视下的认知眩晕,实为传统身体经验与革命规训机制的博弈现场,这种迷失与欲望的双重撕裂,恰恰印证了赵树理创作的核心发现:乡土伦理重构必须通过文本结构的自我裂变方能显现。值得强调的是,赵树理始终保持着批判性审视与建设性超越的双重立场——他既以现实笔触凝视着宗法崩解中的农民失范,又以革命浪漫主义托住镜像畸变中的希望内核;既将政策高压下的认知眩晕转化为社会必然的阵痛表征,又保留着小生产者自我救赎的微观通道。

2.3 教化:隐喻中的“自信”

赵树理的文化自信贯穿于其多部作品之中,通过不同的叙事手法和象征意象得以体现。在《小二黑结婚》的结尾处,赵树理设置了让二诸葛喃喃不宜栽种却仍被区长揭穿迷信谎言这个充满象征意味的场景,恰似一面被打碎的铜镜——神卦的虚妄与新法的威严形成刺眼的对照,映射出乡土社会从蒙昧到觉醒的认知跃

迁。这种敢于打破文化镜面的叙事勇气,根植于赵树理骨子里的三晋文化基因:当他算命工具失效,沦为众人笑柄时,那就是投向封建礼教的投枪,笔尖流淌的不仅是文学家的洞察力,更是太行山民凿石开路的倔强。这种文化自信源于他对晋东南乡村生活的深刻理解和亲身经历,这种实践理性使他能够以真实而富有生命力的方式描绘乡土世界。

在《李家庄的变迁》里,文化自信化作重构社会镜像的魄力。农会减租减息、核实面积的绳尺,在赵树理笔下既是现实工具,更是丈量文化深度的标尺。赵树理不避讳描写佃户们的犹豫畏缩,恰似老石匠凿刻牌坊时不掩饰石料的天然裂纹——这种对文化痼疾的坦然呈现,反而彰显出创作者对乡土文明自我更新的笃定。就像他在文艺座谈会上多次提出的“为农民而创作”的相关理念,就像庄稼人种地,要写农民就得写出泥土的腥气和汗水的咸味。这份直面真实的勇气,正是三晋文化的精神投射。^②

赵树理对文化教化的独特理解,在《登记》的铜钱叙事中达到艺术巅峰。当艾艾的罗汉钱从闺阁信物转为法律凭证,这个物件的蜕变轨迹暗合着他对文学功能的认知:作家当如铜钱般既有传统文化的包浆,又能在新时代的流通中擦出新光,两种意象形成了符号褶皱,暴露出传统与现代的能指纠缠——这种“能指”变化不是简单的道德说教,而是通过作家笔下人物前后的命运变化和情节冲突对比,潜移默化地引导读者反思社会现实。^③流通中的钱币在口口相传中划出变化轨迹,恰似拉康所谓能指的连环,重构出集体无意识中的新型伦理关系。作家青年时期在长治师范组织剧社的经历,就恰似艾艾的罗汉钱——藏住叛逆的火种后,也要显现变革的纹路。这种在传统框架内寻求突破的智慧,正是三晋文化铜钱般外圆内方的生动写照。

晋东南乡村的成长经历,为赵树理提供了永不枯竭的文化底气。他在《三里湾》中描写马家大院时,笔下流出的不仅是小说家的观察,更有亲历者的体温记忆——就像他少年时目睹的沁河改道,既敬畏自然伟力,又坚信人定胜天。这种深植血脉的实践理性,让他的作品始终保持着山药蛋派特有的土腥味与生命力。在北大演讲台上他操着浓重乡音解读作品时,那口不改的晋东南方言,本身就是对文化自信的最佳诠释:既不必向京腔靠拢,也无需为洋理论折腰。

^① 黄修己:《赵树理研究资料》,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第158页。

^②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79页。

^③ 拉康:《拉康选集》,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10年,第233页。

这种深深扎根于三晋文化的自信，最终铸就了赵树理独特而深刻的文学教化观。

在《催粮差》中，刘老汉试图以人情世故同崔九孩圆滑周旋，满足其要求成功释放孙甲午。这个充满张力的情节，既不是对传统的简单否定，也不是对现代的盲目崇拜，而恰似太行山人凿石时寻找天然纹路一样——在尊重文化肌理的前提下开创新局。正如问题小说的理念中心：文学不是粉饰现实的脂粉，而是诊断社会的银镜。当《小二黑结婚》中三仙姑的脂粉盒被打翻时，泼洒在地的不仅是胭脂，更是赵树理对文学教化功能的镜像宣言：真正的启蒙，始于擦净镜面上的历史积尘。

赵树理的作品始终保持着文化镜面的双面特性依赖于这种创作自信——既清晰映照现实弊病，又悄然镀上理想光芒。当合作社的水车在《三里湾》的晨曦中轰鸣，那颤的不仅是木轴与齿轮的咬合声，更是整个乡土社会认知镜框的松脱之声——这声音里好似掺杂回荡着沁河船工逆流而上的号子，谱写了中国乡村现代转型的启蒙交响。

当乡土社会被迫直面变革时，赵树理捕捉到了农民最真实的困惑与挣扎。《李家庄的变迁》中铁锁手中匾额的木屑扎进心里，每走一步都带着旧世界的倒刺；艾艾虽举着婚书奔向自由，却仍在填写申请书时露出迷茫——她撕碎了旧枷锁，却尚未完全理解新规则。这种沾着农民泥土和血痂的状态，恰恰是中国乡土现代化最真实的写照：农民既要挣脱传统捆绑，又需在政策、制度前重新校准自我。赵树理没有美化觉醒，而是忠实记录下每一道裂痕，让读者摸到变革中的人性温度。

3 乡土镜像与人文精神的融合

3.1 情感：“赵氏肯定”

赵树理的肯定是一种超越阶级、融合新旧价值的文化认同与人文关怀。在《登记》的铜钱流转中，这份肯定获得物质性显影。当艾艾的罗汉钱由暗转明时，村公所桌面上那枚金属表面的包浆里凝结着的是超越阶级的悲悯：既怜惜老辈人摩挲铜钱时的礼教记忆，又憧憬青年证书上两枚大拇指印的墨色。这枚罗汉钱恰似主体在象征秩序中的镜像投射——老辈人通过铜钱确认传统伦理的身份认同（想象界），青年则用指印宣告现代性主体的诞生（象征界）。赵树理在此捕捉到农民主体性的双重面向：他们既是被礼教规训的客体，又是通过自由恋爱重构主体性的现代主体。这种不薄今人爱古人的叙事姿态，在《三里湾》玉梅被换工的场景中臻于化境：玉梅并非简单屈从，而是将集体利益高于个人的情感认知，转化为对现代性会计制度的接纳认同。

赵树理像老石匠雕琢牌坊般，在文化裂隙处刻下理解的纹路——尤其他笔下的三仙姑不只是封建余孽，更是被时代碾轧的可怜妇人；金旺兄弟的恶行背后，晃动着权力异化的鬼影。

而这认同与理解，是深植于土地的人文自觉，源自赵树理与晋东南乡村的血脉相连。少年放牛经历赋予他土地伦理的直觉，母亲讲述的杨家将、岳家军戏曲则注入儒家道德叙事。这种交融使其成为乡土经验的翻译者——他拒绝以阶级标签简化农民，而是用农谚、以土地逻辑还原人性真实。当他在《锻炼锻炼》中描写小腿疼与吃不饱两位落后妇女时，她们的狡黠与无奈分明带着土地的褶皱与农事的辛酸。那些被揭穿的自私与懒惰，在他笔下不是阶级批判的注脚，而是对乡土社会自我纠偏中阵痛实录的肯定。这种认同就像他在长治师范教书时，总要把课本里的理论翻译成地头的农谚一样——这种山药蛋派的创作哲学，本质是对农民认知方式的尊重与礼赞。

赵树理的人文镜像始终保持着温暖的景深。《三里湾》里马多寿阻挠开渠的身影，投射出保守文化的沧桑；《套不住的手》中陈老人劳作变形的茧手，又显现集体主义的象征新镜。他拒绝将新旧价值置于非此即彼的审判席，而是像老农嫁接果树般，在传统的砧木上培育新芽。

当文学史试图用山药蛋派框定赵树理时，他又早已带着镢头走向更深的田野。赵树理晚年深入农村推广新农具的身影，恰似其创作理念的终极写照：真正的乡土书写不在书斋的镜前，而在田垄的汗水中。那些曾被批评为土得掉渣的方言叙事，实则是精心打磨的文化透镜——透过《李有才板话》的快板节奏，我们听见的不仅是政策宣传，更是民间智慧的韵律重生。这种超越镜像的人文精神，最终在《福贵》主人公的乡土坚守裂变中完成结局升华。当合作社的锅炉轰鸣时，赵树理没有陶醉于将要到来的工业文明凯歌，而是用现实主义的镜头捕捉福贵的生存问题，像是文化传承江河中的一滴情感露珠。在制度和人性夹缝之间充满张力的时刻，理想我和现实我的情感认同分裂，却在对农耕伦理认同上达成奇妙隐秘的和解。正是这种对变革中人性的细腻捕捉与深情描绘，使赵树理笔下的乡土世界充满了鲜活的生命力与永恒的魅力，而非沦为冰冷的理论图式。

我们在新时代依然能触摸到其背后的温度——那不是批判家的寒光，而是农人的手掌的温热。赵树理用毕生实践证明：真正的乡土自信，不在于将乡村供奉为

文化琥珀，而在于相信这片土地永远孕育着自我更新的力量。就像他在平顺县农村推广深耕犁时，总要和老者们一起抽袋旱烟——文学的终极意义，或许就藏在这俯身倾听的姿态里。

所以，赵树理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不仅站在农民主体的立场上发声，更深刻理解并尊重农民自身的价值观与认同感，从而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人文关怀与文化自觉。

3.2 人性：“文人”与“人文”坚守

赵树理作为一位扎根乡土的作家，其创作始终在文人的理性思考与人文的情感关怀之间寻求平衡。《与青年作者谈创作》里浓缩着赵树理作为知识分子的精神图谱：既要刺破黑暗的灯芯，又要当托举光明的烛台。他笔下那些沾着泥腥的文字，始终在文人良知与农民立场的天平上寻找支点。这种双重坚守不仅塑造了他的文学风格，也为理解中国现代乡土文学提供了新的视角。《李有才板话》中老杨同志的身影，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其腰间旱烟袋成为其平民干部的象征，将真理的火种埋进阎家山的冻土——当村民因恐惧不敢发声时，老杨不仅默默记录下每一句控诉，还组织了农救会。这人文主义微弱的镜面反光射向了封建制度的褶皱深处，而赵树理通过老杨帮忙打谷、扬场的场景，将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化作农民可见的生活图景。

农民生活的困顿现实，在赵树理笔下淬炼成最本真的人文主义证言。

而文人和人文的双重坚守，在赵树理拒领文学奖金的铁事中获得肉身化诠释。赵树理还拒绝提高版税，认为这不符合农民的实际需求。这份近乎执拗的农民立场，在作品里转化为独特的叙事伦理：《催粮差》中崔九孩人前道德败坏人后向二爷低声下气的荒诞，被他处理成文化转型的必经阵痛而非讽刺素材；《三里湾》里王宝全对双轮双铧犁的质疑，最终在集体协商下被渐进式地消解。这种拒绝廉价启蒙的创作态度，恰似太行山的这些农民犁地——深耕的铧头既翻出新土，又小心避开作物的根须。这些不仅反映了镜像觉醒的过程，也折射出赵树理对人性复杂度的深刻理解，正如他在《小二黑结婚》中对小芹形象的刻画也始终保持着血色温度。小芹的婚恋抗争，在革命叙事大镜框下本可简化为反抗符号，却被他赋予更丰盈的生命质感：结扎的脚裤中既有礼教桎梏的碎屑，又有释放在月夜相会时主体觉醒的荷尔蒙气息。这种对人性复杂度的文人尊重，让他的作品避开了同时代常见的概念化陷阱。当他在大连会议上坚持问题小说理念时，守护的不仅是创

作原则，更是文学映照真实生活的镜面品质。

晚年的他推广新型农具的身影，恰似其人文精神的终极注脚。在晋东南的沟壑间，这位一身粗衣的作家在农民地头间参与调试新工具时，手上沾满的不仅是泥土，更是知识分子还债于土地的精神印记。他不仅关注技术的应用，更关心农民的实际感受。那些曾被诟病土得掉渣的方言叙事，实则是精心打磨的文化透镜——透过《孟祥英翻身》妇救会的大红花这一镜像符号，呈现的不只是新旧伦理的棱镜冲突，更是赵树理对新的政治象征的刻意淡化。他转而描写祥英的手部等肢体细节，将劳动美学转码成革命符号，翻译成了农民能理解的民间智慧。这种将文人智识沉入土地再结晶的创作实践，让他的文字始终带着地气的湿润与体温。

在新时代回望赵树理，依然能感受到镜面后的余热——那不是属于批判家刀锋上的寒意，而是农人捂在胸口窝头的体温。

赵树理以一生的创作实践告诉我们，真正的乡土启蒙不是高高在上的说教，而是脚踏实地的耕耘，是在每一寸土地上播撒希望的种子。人文精神的最高境界，是让知识分子的眼镜片上永远蒙着农民的汗雾。这种双重坚守的遗产，至今仍在太行山的梯田上泛着腾腾的热气——那是文明根系深扎泥土的证明，更是人性光芒穿透时代雾障的星火。

3.3 现实：未完成的主体意识构建

在艾艾的成长中，赵树理以敏锐的洞察力捕捉到了人物在觉醒过程中的微妙心理变化，这种对未完成主体的真实呈现，不仅是对农民个体的深刻刻画，更是对整个乡土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深刻反思。这位自称农民代言人的作家，始终在理想与现实的夹缝间执灯前行——当《登记》的女主人公将小方戒与罗汉钱交换时，铜与银的碰撞跃动的不仅是制度文明的火光，更有作家对人性复杂度的深切凝视。那些未被完成的觉醒轨迹，恰恰成为丈量人文深度的标尺。

艾艾在村公所填写结婚申请书的迷茫，如同太行山晨雾中摇曳的灯笼，生动地展现了她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徘徊。这种状态并非个例，而是当时众多农民的真实写照。这种迷茫和困惑正是农民主体意识尚未完全构建的表现，与拉康理论中个体通过误认建立自我认同的认知发展过程相吻合。当她对王助理员的程序提问进行标准式回复时，这既是对婚姻自主符号的虔诚拥抱，又反射出了对于传统镜像的无意识顺应——就像拉康所谓，孩童初次试穿新衣，既欣喜于镜中鲜亮的倒影，又局促于陌生的身体轮廓。她仍处于从想象界

到象征界的过渡阶段，而赵树理敏锐捕捉到这种认知时差：艾艾倔强地第三次递上申请书，恰是主体意识渴求认证的瞬间。但之后她虽从众人非议对象到婚姻模范的位移中虽完成了制度认证，却始终未能孕育出具有主体性的精神自觉——她的抗争止步于挣脱封建桎梏，心理上尚未抵达建构独立人格的思想阶层。虽然赵树理没有用知识分子的想象给这个姑娘戴上思想者的桂冠，忠实记录着她拽着婚姻法的红绸蹒跚学步的姿态，但恰恰是这种对未完成主体的诚实呈现，也更深层地折射出社会现实中作家自身的历史局限。

所以，人物们未完成的觉醒，暗合着作家自身的创作镜像。在赵树理构建的乡土艺术长廊里，艾艾们举着婚书奔向光明的身影始终蒙着晨雾——她们既不像传统妇女般蜷缩在礼教镜框里，也未完全踏入新社会的全景明镜。这种半觉醒的过渡态恰似太行山区的春耕时节：冻土虽裂，新苗未壮，犁铧翻出的沟壑里还掺着去岁的枯根。所以，真正的启蒙不在塑造完美的主体，而在于照亮觉醒路上的认知沟壑。正如赵树理小说本身就是通过镜像暴露与现实执行的裂隙来完成其启蒙使命，只有当后来者既看清前行者踏出的坑洼，又能以批判性思考浇灌出新的路径，晨雾中的身影才能在代际传递中渐次清晰。

赵树理深耕乡土的文学犁铧，能精准剖开封建伦理的冻土层，却在现代性的深层根须上略有沉渣。就像《套不住的手》里他熟稔陈老扶犁各种细节的筋肉记忆，却难解青年徒弟们对旧式技术的焦虑。《三里湾》里玉梅的桑杈在谷场划过的痕迹，恰似知识分子构想时的新农民的白描形象——轮廓已具，神采未充。这种局限非关才力，更是因为整个时代的镜面尚未镀全：当艾艾们刚刚挣脱三从四德的镜框，历史也还来不及为她们铸造完整的认知模具。这些未完成的主体镜碎片，拼凑出最真实的乡土觉醒图景。

这些带着裂痕的镜像，或许比完美无瑕的银镜更贴近乡土中国的精神胎记。而如今时代，亦是。

千万农民在历史夹缝中如同早春的麦苗，根须已突破冻土，叶片仍挂着霜痕。是赵树理让我们看见晨雾中踉跄的身影，听见新鞋踩碎薄冰的脆响，触摸到未竟之路上本真的时代体温。赵树理笔下未完成主体的形象不仅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的农民心理状态，也为当代乡土社会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镜鉴。比如，在当今乡村振兴战略推进过程中，当我们看到短视频平台上有年轻农妇既展示传统剪纸技艺又模仿都市妆容的矛盾形象，或观察到返乡青年在电商创业与宗族礼俗

间的身份摇摆时，那些半觉醒的文化症候依然在新时代的剧场里重复上演。这种现象提醒我们，农村现代化不仅是基础设施与制度体系的革新，更需要关注个体在转型过程中遭遇的认知时差与符号困境——艾艾当年对婚姻法文本的困惑，到今日农民面对直播带货、土地流转等新符号系统时，同样经历着从想象界到象征界的艰难跨越。只有将这种主体意识的渐进性生长纳入政策考量，才能真正实现乡土社会的精神现代化。

赵树理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始终平视的姿态。《登记》中那枚罗汉钱，既承载着老辈人对传统的眷恋，又托起青年对自由的渴望，而艾艾摩挲铜钱的手指，则泄露了变革中个体的忐忑与坚定。他笔下的人物从非圆满的觉醒者：王玉生钻研技术时的痴迷、马多寿紧攥地契的执拗、甚至三仙姑扑粉的荒诞，都显得真实可触。这种未完成的主体，正是赵树理对农民最深情的告白——他相信乡土文明自有其生命力，如同太行山的石头，既承载着千年风霜，也终将在裂痕中迸发新芽。结束语

赵树理的乡土镜像实践展示了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个体觉醒与社会转型的特殊互动形态。本研究通过拉康镜像理论的三维透视，揭示出这种文化转型蕴含着三重张力结构：首先，“文化子宫”的母体隐喻在《登记》等文本中具象化为婚书制度等符号系统，传统伦理规约与新式契约关系的脐带式纠缠，彰显了乡土社会认知基质的裂变轨迹；其次，《小二黑结婚》中艾艾的肢体政治表明，身体符号在象征界编码与想象界解码间的转译过程，构成了微观层面的现代性发生机制；最后，“未完成主体”在《催粮差》等文本中的渐进式觉醒，印证了个体与集体转型既不同步又相互塑造的东方现代性特征。

这种理论阐释具有双重突破意义：在方法论层面，通过建构“乡土镜像”分析模型，实现了拉康理论与中国经验的创造性对话，既验证了镜像理论对非西方语境的解释效度，又揭示了其理论盲点——发展中国家现代性转型中特有的传统延续性；在现实观照层面，赵树理笔下人物在婚俗变革、基层治理等场域经历的认知阵痛，为理解乡村振兴战略中的文化认同重构提供了历史镜像。其乡土叙事揭示的在传统中分娩现代的独特路径，不仅丰富了非西方现代性理论谱系，更提示我们，任何文化转型都需要在个体与社会的辩证运动中寻找平衡支点。

赵树理的创作具有鲜明的启蒙意图。他以笔为刃，试图在乡土社会的旧秩序中开辟出一条通向现代性的道路，唤醒民众的自我意识，推动社会变革。他深知传

统文化的枷锁对个体发展的束缚,因而致力于通过文学作品展现新思想、新观念,引导人们挣脱传统伦理的桎梏,追求自由与平等。

但同时,其创作并未能完全突破传统文化的规范。他深受乡土文化的滋养,其创作理念与审美趣味不可避免地带有传统文化的印记。就像他笔下那些处于觉醒过程中的“未完成主体”一样,赵树理本人也处于传统与现代的交织地带,是一个未完成的主体。他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艰难前行,其创作既是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批判,又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传统文化的牵制与影响。这种复杂性使得赵树理的创作在现代化进程中具有独特的价值与意义,也为我们理解发展中国家文化转型的艰难与曲折提供了宝贵的范例。

参考文献

- [1] Jiaxin Zou; Yuqing Wang. Self-identity's Construction Process in The Moon and Sixpence from Lacan's Theory of the Mirror[J]. Scient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Volume6, Issue12. 2024: PP123-12.
- [2] Licandro Daniela. Affective Chinese Socialist Realism: A Reading of Zhao Shuli's Sanliwan Village[J]. Chinese Literature and Thought Today. Volume55, Issue1-2. 2024: PP 67-79.
- [3] Malin B D. Kohut and Lacan: mirror opposites[J]. Psychoanalytic Inquiry, 2011, 31(1): 58-74.
- [4] Mu-zi L I U. From Mirror Theory to Oedipus Complex: A Lacanian Interpretation of Night, Mother[J]. Journal of Literature and Art Studies, 2024, 14(9): 759-764.
- [5] Xiaoping Wang. "Problem Stories" as Part of the "National Form": Rural Society in Transition and Zhao Shuli's Peasant Stories[J]. Frontiers of Literary Studies in China. Volume 6, Issue 2. 2012: PP208-231.
- [6] 范雪. 生活的活力: 赵树理小说与根据地基层文化[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06): 105-113.
- [7] 胡成恩. 拉康“镜像理论”对笛卡儿以来“自我”观的还原与重构[J]. 宁夏社会科学, 2018(03): 20-26.
- [8] 季玢. 论赵树理小说的乡村文化建构[J].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 32(04): 150-154.
- [9] 金炜泓. “破局者”赵树理——论赵树理对中国乡土小说的革新与发展[J]. 中州大学学报, 2023, 40(02): 13-18.
- [10] 李冬春. 赵树理文学创作中的农民形象解读——评《李家庄的变迁》[J]. 热带作物学报, 2020, 41(06): 1294.
- [11] 刘晶. 论赵树理的小说叙事风格——浓郁的乡土情结[J]. 文化学刊, 2019(06): 92-94.
- [12] 刘雪琴. 论民间隐形结构下的中间人物——以赵树理合作化小说为例[J]. 忻州师范学院学报, 2022, 38(06): 42-48+54.
- [13] 罗先海. 现代性视域下乡土中国的当代图景[D].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 2010.
- [14] 刘江伟, 杨珏. 用大众语言传递时代脉动[N]. 光明日报, 2025.04-28(009). 2025.
- [15] 魏信迪, 吴淑玄. 文学场域与身份建构: 赵树理农村写作的进退维艰[J]. 大众文艺, 2025, (06): 19-21.
- [16] 洪海涵. 基于拉康三界理论的《终结的感觉》主体建构研究[J]. 长江小说鉴赏, 2025, (08): 72-75.
- [17] 李思贤. “出走”的寓言式叙事模式下觉醒女性的镜像探究——读里尔克的《布里格手记》[J]. 白城师范学院学报, 2025, 39(01): 65-71.
- [18] 拉康. 拉康选集[M]. 上海: 上海三联出版社, 2001.
- [19] 米歇尔·福柯. 文字即垃圾: 危机之后的文学[M].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6.

版权声明: ©2025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